

我与广播的情缘

上世纪 80 年代，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基本依靠报纸和广播。那时，20 岁出头，当纺织工人的我喜欢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每天早上 6 点半，我都是准时收听《新闻和报纸摘要》，后来，开设了中午 12 点档的《新闻和综合》节目，每次半个小时，成为我的又一道“午餐伴侣”。

1982 年 3 月 20 日 12 点，我一边吃饭一边收听《新闻和综合》节目。节目播完之后，收音机里传来铁城和晓澄那亲切而又熟悉的声音，他们播送的是配乐通讯《最后一次党费》，介绍了吉林朝鲜族优秀党员干部金龙浩同志一心为公，到生命的最后时刻还不忘缴纳最后一次党费的事迹。我听后心绪难平，提笔给该台写了一篇听后感。出乎意料的是，一周后的《新闻和综合》节目摘要播发了我的稿件，由此，我与该节目编辑组建立了联系。一年多来，我们通信几十次，编辑老师给了我指点和鼓励，并多次采

用我写的评论，为我走上新闻之路奠定了基础。后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办的《广播之友》周报，举办了一次全国性的“我与广播”征文，我的那篇《一篇难忘的配乐通讯》有幸被收入征文丛书。

但凡用心用情去做一件事情，往往结果都不会太差。上世纪 90 年代，当我还是一名宣传干部时，已经成为石家庄广播电视台《声屏之友》报的特约撰稿人，并开设了专栏。中超红火的 2014 年，在河北永昌队的主场——石家庄裕彤体育中心，河北电台的《体育大看台》节目，多次现场连线我进行赛前、赛后直播评论，很多开车的朋友听到我的评论后，立马给我打电话，一种被成就感裹挟的虚荣心让我多少有些飘飘然。

在加入报刊收藏大军后，新闻类报刊包括广播电视台报刊收藏成为我的主打项目之一，至今我收藏着《中国广播报》《河北广播电视台报》《声屏之友》创刊号等，还有 1980 年 1

月《广播电视杂志》月刊创刊号（天津），1982 年 1 月《中国广播电视台》月刊创刊号等。

今年 4 月 21 日至 26 日，我和大姐、大哥从石家庄赴天津市亲，这是继 10 年前组团赴津之后的又一次活动。

4 月 25 日上午，我们游览天津鼓楼，大约 11 点半，在鼓楼北侧附近的一条街道上，我看到一个旧货市场。我走进这个市场淘宝。在一个地摊上，我看到一本封面发黄的《广播通讯》旧刊，拿到手一看，是 1958 年的创刊号，最终以 20 元买下。该刊 1958 年 7 月 1 日创刊，由当时河北和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共同主办，那时津冀还没有分家，天津是河北省会。这份小册子 32 开，共 30 页，有创刊辞，设两个小栏目，中国广播新闻界前辈梅益先生的大作排在醒目位置，还有 8 篇天津和河北电台人员撰写的新闻广播业务文章。小册子是内刊性质的创刊号，时隔 66 年，保存下来很不容易。

陈富生/文



作者收藏的《广播通讯》

回石家庄后，我跟几个熟悉的河北电台主持人一说，他们都说非常值得。

眼下，当传播技术的变革几乎无情地迭代了所有传统媒体的时候，我由衷地向曾经引领我成长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其他广播媒体致敬。因为那是青春，那是我蓬勃向上的最好时光。

陈富生/文

欢送解放军南下

1949 年，邢台南宫县城陆续迎来了东北野战军南下的队伍。他们在县城宿营休整，次日又从这里启程南征。在城里，部队的文工团天天晚上在县礼堂公演文艺节目。我曾经看过

他们演出的富有东北地区韵味的革命歌剧《赤叶河》。

县城南关是部队整装出发的起点。清晨，部队的军乐团来到这里举行欢送仪式，齐奏乐曲，热闹非凡。出发的解放军指

员迈着矫健的步伐，整齐地沿街而过。他们不断地高呼“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等口号。大街两旁的男女老少夹道欢送。我和我村（普济桥村，紧靠

南关）的同伴们挤在人群的前排，跟着乡亲们一道鼓掌致意，挥手相送。附近村里的老乡们，也都自发地赶来欢送子弟兵。

陈宗尧/文

孙家江/文

图说 我们的价值观

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中宣部宣教局 人民日报社 中国网络电视台

图说往事

全家合影



1978 年，我 12 岁。那年，父亲用小拉车拉着全家人，来到 10 公里之外的石家庄行唐县城。我们找到一家照相馆，排了一上午的队，才拍了这张全家合影。为了拍照，我还借了一身当时流行的绿军装。图中间站立者为本文作者。

康立新/文并供图

怀念母亲

母亲的老家是江苏省连云港市灌云县，她生于 1919 年，因病于 2009 年在石家庄病故，享年 90 岁。

母亲小时候吃尽了苦头，因为家里穷，家人生病了也无钱医治，到后来家里就剩下她和我外婆母女二人。于是，外婆带着 7 岁的她离家一路南下，逃荒要饭，后来在江苏省盐城市滨海县的八巨镇落脚。外婆给一户朱姓人家做佣人，她们母女二人才得以勉强度日。

母亲 16 岁时，经人介绍嫁给了我父亲。因父亲是独生子，他的前妻生了 3 个女孩后，就再也没有生男孩。在旧社会，家中无男孩就会被称为绝户头。父亲是做生意的，家里条件还可以，于是就离婚了，之后娶了我母亲。

过门儿后，父亲的前妻并没有离家，她成天指使我母亲干活，母亲受尽了欺凌。1944 年，母亲生下我大哥。有孙子了，我奶奶一家人非常高兴，母亲的日子才好过了点儿。1946 年，母亲又生了我。日本鬼子烧了八巨镇以后，

父亲的生意没法做了，一家人生活拮据，艰难度日。1952 年，父亲带着全家人搬到江苏省射阳县开荒种地。

1953 年，父亲和母亲离婚，当时母亲才 33 岁。离婚后，父亲把小街东头用芦苇编的篱笆当墙的茅草房收拾出来，让外婆、母亲、我和不到 1 岁的弟弟居住，大哥留给了父亲他们。母亲不得不独自挑起生活的重担。但是她自由了，从此她不向困难低头，靠辛勤劳动撑起了这个家，把我和弟弟抚养长大。

母亲年老以后，我们兄弟姐妹都已成家立业，各家的条件都不错。我曾经带她去上海的哥哥、弟弟家，或是来石家庄在我家住段时间，去北京参观故宫、游览长城，享受幸福的晚年。晚年的母亲很知足，她总是心心念念地表示，要感谢党，感谢伟大祖国。

亲爱的母亲，儿女们非常怀念您。我们会永远感恩母亲，感恩伟大的母爱！

吴月梅/文